

基于后代刻本混淆了两个原本不同的字，𦉳与《说文》“判木为片”的“片”、“𦉳”无关，只是因为后代汉字楷化后形近而讹同。这可以由从𦉳的一系列字的隶定看出𦉳、𦉳、𦉳(疾)：“以人卧床上会疾病意，为疾病之疾的初文”^[17]；𦉳、𦉳、𦉳(梦)：“因梦与寝卧关系最切，寝卧必以床为具，故以‘𦉳’代表寝卧，表示梦是寝卧时发生的一种现象。”^[18]；𦉳、𦉳、𦉳(疴)：“象人仰卧床上，有手抚摸其腹之状，盖疾病之名。”^[19]；𦉳： “当像一人卧病床上，从木象以火艾灸病之形。”(胡厚宣释)^[10]；𦉳(葬)“象朽骨陈于床上以会葬之意”(李孝定释，见《甲骨文字集释》，2331页)。

西周，床仍然专指卧具。《诗经·小雅·斯干》：“乃生男子，载寝之床”，《诗经·幽风·七月》载：“十月蟋蟀入床下”^[11]。《斯干》、《七月》都是西周时诗，显然，此时床仍为寝具。

东周时期，床的含义发生了第一次变化，出现专指坐具用的“床”。《礼记·内则》：

父母舅姑将坐，奉席请何乡；将衽，长者奉席请何趾，少者执床与坐。^[12]

《商君书·画策》曰：

是以人主处匡床之上，听丝竹之声，而天下治。^[13]

此处匡床是一种专门的坐具，可见，早先有学者认为“自汉起，始坐卧两用”的说法失诸过晚^[14]。汉刘熙《释名·释床帐》曰：

人所坐卧曰床。^[15]

上引《说文》亦如此。这说明东周秦汉时期床已经泛化为坐具和卧具的现象已十分普遍。唐宋时期，一些小坐具，都可称为床。如李白《长干行》：“妾发初复额，折花门前剧。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”，这里的床历来有两解，或坐具或井架。郭沫若等学者甚至怀疑李白《静夜思》中的“床”，也是坐具或井上围栏。《释名·释床帐》：“长狭而卑曰塌”，服虔《通俗文》：“床三尺五曰塌，八尺曰床。”汉尺约当24厘米计，则塌长80余厘米，床约长190厘米，与现代床相当。如此，泛化为坐具的床又再次

从卧具中分化出来，小者为榻，大者称床。

三国时期，床的词义发生了第二次转变。建安时期的古诗《孔雀东南飞》曰：

媒人下床去，诺诺复尔尔。

这里的“床”是指屋内架空的地板，即唐人所谓“人之栖托谓之床”^[16]，形、用似床而已。现代日语中的“床”仍作此解。

此后古文献中出现的“床”字，逐渐开始泛指各类床形物。如：辘床^[17]、绣床^[18]、琴床^[19]、乃至机床等等。

关于殷商时期所使用的床，我们只能从甲骨象形文“𦉳”中获得最基本的认识。依李孝定“上象床板下象足枕之形”的说法，殷商武丁时期床的构造主要由三部分组成：床身、床足和足枕，其中床身似由一长方形木板构成，是床的主体构件。西周床的形制也尚无具体资料可供讨论。

到战国时期，床有了出土资料。1957年，信阳长台关楚贵族墓出土了两件保存完好的木床^[20]，床由床身、床足、床栏三部分组成。床身是由纵(长)、横(短)方木条制成的长方框，但不知床板床垫如何构成。六只床足分别安装在床身的四隅及前后两边的中部。床栏是用竹、木条制成的方格，围绕在床身的四周，床身的前后两边的中部不设床栏，各留出缺口以供上下。木床的整体构造十分优美、简洁与合理。床长225、宽136、高42.5厘米，尺寸大小可容纳两人卧息。木床通体髹黑漆，床身的周围绘以朱色的连云纹，床足镂雕成对称的卷云状，而且每边床栏的上隅附有铜制镶角，工艺精湛，装饰华美。1987年又在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了折叠床^[21]，折叠床复原后的整体形制结构与信阳长台关木床基本相同，也由床身、床栏、床足三部分组成，只是其为折叠床，床身由两个形制完全相同的方形框架拼接而成，可对折。床全长220.5、宽135.6、通高38.4厘米，通体髹黑。此外，河北省战国中山国灵寿城发掘的6号墓发掘出土了中山国使用床帐的残件，如帐椽、帐杆、帐椽帽、帐椽卡钩和帐杆接套，帐椽与帐杆已朽成灰迹，原先木质均涂有黑漆^[22]。这些残件都是组合帐架的必要部件，说明架子床早在战国时期已经使用。

早期作为坐具的床，其形制可知。1958年河南郸城发现的汉榻，是最早的实物资料。榻为青色

石灰岩质制成,榻面呈长方形、四腿,长 87.5、宽 72、高 19 厘米,床足截面为矩尺形,榻面上刻有隶书:“汉故博士常山大(太)傅王君坐榻”^[23]。80 年代江苏仪征胥浦 101 号西汉墓出土的木床榻,床身由两块长方形木板拼接而成,木板左、右两侧凿有两排方形卯眼,与下面木楞及足相接,木楞下接长形足枕,榻的背面和右侧围有木板屏风,榻长 114、宽 90 厘米,包括屏风的围板通高 26 厘米。出土时上面散乱放置凭几、木俑、耳杯等^[24]。此外,1954 年山东省安丘市王封村发现的汉代画像石上的两张带屏大床,则是床发展到东汉时期形制的典型图画代表^[25]。床由屏风、床身和床足三部分组成。床身为一长方形形状的木板,正面所能看到的左右两床足成对称卷云状。屏风围绕在床的后侧和左侧。床上分别有男女主人正坐其上,男主人凭几而坐,女主人坐于另一带屏大床上,身旁有一小儿。20 世纪 50 年代发掘的河北望都汉墓,其壁画有两人各坐一榻形象。两榻形制、大小大致接近,床足间有弧形券口牙板曲线,榻面铺有席垫。其二号墓所出土的一石床^[26],床的形制与山东安丘画像石上带屏大床的形制完全相同。床身为一长方形石板,有四足,呈合页般对折卷云状。可见此种式样的床在东汉时期较流行,床的整体形制趋向简单,但十分大方和美观。山东嘉祥武氏祠、山东嘉祥宋山小石祠画像石,及山东曲阜城关镇颜林村、山东省临沂市白庄、山东省临沂市独树头镇西张官庄、山东省费县鲍家庄牛头山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和陕西绥德汉墓^[27]等等石刻中也都供有供坐卧的床榻形象。

早期的床质料趋向多样化,但多数床为木制。《列仙传》:

老莱子,楚人。当时世乱,逃世耕于蒙山之阳,莞葭为墙,蓬蒿为室,杖木为床,著艾为席,菹芰为食,垦山播种五谷。^[28]

信阳长台观楚墓出土的髹漆大床也为木制。也有使用土床的记载,如《初学记》卷二五引《燕书》曰:“公孙凤隐于昌黎九城,寝土床”^[29],不知是否即后代的炕。此外还有象牙床、玉床和玳瑁等名贵材质的床。《战国策·齐策》记载:“孟尝君出行国,至楚,献象床。”鲍彪本注:“象齿为床。”^[30]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卷六十八:“纣有谏臣,名为左强。夸而目巧,教为象郎。将至于天,又有玉床。犀玉之器,象箸而羹”^[31]。又《西京杂记·玳瑁床》曰:“韩嫣

以玳瑁为床”。此类床当非普通人所常用。

考古发现也有石制的床,如望都二号汉墓石床和河南郸城石灰岩质床;70 年代南京象山七号晋墓出土了陶榻,长 112、宽 65、高 21.4 厘米,出土时上置陶凭几、陶盘等^[32],但是这些硬质床是否为实用器仍待考证。

二 与早期床相关的古代礼俗

床是古代礼俗文化的重要物质组成。商周的床礼已不可详考,只有部分线索可供今人追溯。这首先反映在丧葬方面,先秦礼书记载:

始死,迁尸于床,衾用敛衾,去死衣。(《礼记·丧大记》)

大敛於阼,君以篋席,大夫以蒲席,士以苇席(《礼记·丧大记》)

三日而敛,在床曰尸,在棺曰柩。(《礼记·间丧》)

父母之丧,居倚庐,寝苫枕块,不说经带。齐衰之丧,居垩室,芻翦不纳。大功之丧,寝有席,小功缌麻,床可也。此哀之发于居处者也。(《礼记·间传》)

细考诸多考古所见棺槨情况,多与古人卧床暗合,这些都反映了古人将生活中的床融入丧礼之中的“事死如生”的礼制原则。《周礼·天官·玉府》:“掌王之燕衣服,衽席,床第,凡褻器”,专设职官掌管天子床第事宜,床被纳入了周代最正规的礼制体系。

战国秦汉以后,商周古礼虽逝,但其诸多仪节及其礼制观念却已经深入人心。尤其反映在待客之道上。作为卧具,同床意味着极为亲密无间的关系。《燕丹子》卷下记载:“太子常与轲同案而食,同床而寝”^[33]。霍光、金日磾、上官桀、桑弘羊等顾命大臣“于天子所卧床前拜职”,实现其权倾朝野的地位^[34]。见客于卧床,是极为轻慢之举。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:“见汤,汤坐床上,丞史遇买臣弗为礼。买臣楚士,深怨,常欲死之”^[35]。在坐床上接见客人,坐姿是不能垂足或箕坐的,否则就带有辱客的暗示了。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中记载酈食其求见沛公时“沛公方踞床,使两女子洗足”,此处“踞”的姿态就是“坐在高坐具上将双足垂在体前”^[36]的坐姿,因此酈生不但不拜而且指责其“不宜踞见长者”^[37]。又《汉书·英布传》中记载:“汉王方踞床洗,而召布入见。布大怒,悔来,欲自杀。”相反,座间的恭敬是很高的荣誉。《汉书·张禹传》:“上亲

拜禹床下,禹顿首谢恩。”^[38]

此外,床还与养生习俗有关。《吕氏春秋·孝行》:“修宫室,安床第,节饮食,养体之道也”^[39],《史记·礼书》:“疏房床第几席,所以养体也”^[40]。汉李尤《卧床铭》:“体之所安,寝处和欢,夕惕敬慎,崇德远奸。”^[41]

综上,床在商代、西周专指卧具。东周开始,床衍生兼指坐具的含义,并逐渐从中分化出床、榻两类大小不同而又形近的坐具。到三国以后,床的词义进一步泛化,派生出屋内的床形架空地板等义项,其外延最后延伸覆盖了多种与坐卧无关的床形物品。“床”的词义、形态与礼俗的演变,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上中国人起居习惯与礼制风俗的演变。

- [1]如:〔日〕滨田耕作等著、杨炼译:《古物研究》,商务印书馆,1936年;冯汉冀:《驾头考》,《史学论丛》,四川大学历史系1956年;杨鸿:《家具演变和生活习俗》,《文史知识》1987年第1期;《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家具史的研究》,《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》,文物出版社1989年;胡德生:《浅谈历代的床和席》,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,1988年第1期;王本泉:《床榻古今谈》,《中国木材》2001年第1期;徐毅、徐长玉:《我国床的发展研究》,《家具》2002年第4期;王丽艳:《我国古代的榻及其相关礼仪制度》,《文化学刊》2006年第1期等。
- [2]分别见于前引《浅谈历代的床和席》、《我国床的发展研究》、《我国古代的榻及其相关礼仪制度》、《古物研究》、(第102页、103页)、《床榻古今谈》、《驾头考》诸篇。
- [3][5][10]于省吾主编:《甲骨文诂林》,中华书局1996年,第2088~3091、3088、3102页。
- [4]李孝定:《甲骨文字集释》,台湾中央研究院出版社1970年,第2329页。
- [6]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:《甲骨文编》,中华书局1965年,第303页。
- [7][9]董莲池:《说文部首形义通释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,第203、202页。
- [8]屈万里释,见《甲骨文字集释》,第2527页。
- [11][12]清·阮元校刻:《十三经注疏》,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。
- [13]战国·商鞅等著、章诗同注:《商君书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4年,第60页。
- [14][日]滨田耕作等著、杨炼译:《古物研究》,商务印书馆发行,1936年版,第102页。
- [15]清·王先谦撰集:《释名疏证补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,第287页。

- [16]唐·惠琳:《一切经音义》卷六十一“牀”注引《古今正字》,转引自:宗福邦等编《故训汇纂》第1393页,商务印书馆2003年。
- [17]李白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:“怀余对酒夜霜白,玉床金井冰峥嵘”,王琦注:“床,井栏也”。杜甫《羌村三首》:“赖知禾黍收,已觉糟床注”。李贺《后园凿井歌》:“井上辘轳床上转,水声繁,弦声浅”,王琦注等。
- [18]五代·胡令能《咏绣障》:“日暮堂前花蕊娇,争拈小笔上床描。绣成安向春园里,引得黄莺下柳条”。明代杨基《美人刺绣》:“风送杨花满绣床,飞来紫燕亦成双。”
- [19]北宋·周邦彦《解连环》:“燕子楼空,暗尘锁一床弦索”。
- [20]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:《信阳楚墓》,文物出版社1986年,第42、43页,图版30。
- [21]吴顺青、徐梦林、王红星:《荆门包山2号墓部分遗物的清理与复原》,《文物》1988年第5期。
- [22]河北省文物研究所:《战国中山国灵寿城—1975~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》,文物出版社2005年,第171页,图版77、78。
- [23]曹桂岑:《河南郟城发现汉代石坐榻》,《考古》1965年第5期。
- [24]扬州博物馆:《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》,《文物》1987年第1期,第7页,图板三:6。
- [25][27]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:《中国画像石全集3》,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,第128~129页。
- [26]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编:《望都二号汉墓》,文物出版社出版1959年,第32页图。
- [28]汉·司马迁撰:《史记》,中华书局1959年,第2142页。
- [29]唐·徐坚撰:《初学记》,中华书局出版1963年,第601页。
- [30]西汉·刘向集录:《战国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,第385、386页。
- [31]汉·司马迁撰:《史记》,中华书局1959年,第3234页。
- [32]南京市博物馆:《南京象山5号、6号、7号墓清理简报》,《文物》1972年第11期。
- [33]无名氏撰,程毅中点校:《燕丹子》,中华书局出版1985年,第12页。
- [34]汉·班固: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1962年,第2933页。
- [35]汉·司马迁撰:《史记》,中华书局1959年,第3143页。
- [36]杨泓:《逝去的风韵·说坐、跏和跏坐》,中华书局2007年。
- [37][40]汉·司马迁:《史记》,中华书局1959年,第358、1161页。
- [38]汉·班固: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1962年,第3350页。
- [39]战国·吕不韦:《吕氏春秋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,第101页。
- [41]引自《初学记》卷二五,第602页。